

从手段到目的: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的内在逻辑

——兼论阿伦特对马克思的重大误解

彭小伟¹, 张雷²

1. 嘉应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梅州 514015;
2.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55

摘要: 在人本学意义上, 马克思的劳动具有手段和目的的双重属性。在他看来, 劳动不仅是手段而且是目的。但是, 阿伦特却误解了马克思的劳动解放理论, 将劳动的目的属性和手段属性割裂开来, 认为马克思的劳动解放理论是一种乌托邦。事实上, 马克思并不否定劳动的手段属性, 其理论所要批判的是: 在无限增殖的资本魔咒下, 劳动沦为了只剩下手段属性的谋生工具, 工人成为资本主义机器体系中的一个“部件”, 人沦为了机器。就此而言, 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的旨趣在于消除被异化了的劳动“经济必然性”, 恢复劳动手段和目的的双重属性。以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为切入点, 梳理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的内在逻辑, 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的科学内涵, 回应各种针对马克思劳动解放学说的质疑, 而且有助于准确定位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论旨趣, 为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劳动; 资本; 目的; 手段; 机器

中图分类号: A81; D09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 12186/2024. 04. 004

文章编号: 2096-9864(2024)04-0026-09

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问题, 不仅是当代政治经济学讨论的热点, 而且是当代政治哲学的核心。在马克思看来, 劳动既是人生产自我的过程, 又是人改造外部世界的目的性活动。在类本质意义上, 劳动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创造性活动, 是人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然而, 在资本主义社会, 劳动的这种自由自觉的类本质属性被彻底否定了。“对劳动者来说, 劳动是外在的东西, 也就是说, 是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 因此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 而是否定自己, 不是感到幸福, 而是感到不

幸, 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 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 因此, 马克思详细分析了劳动异化为“手段”的历程及其原因, 从中寻找解放劳动、摆脱资本对劳动之规训的有效途径。对此, 阿伦特却不以为然, 她认为, 马克思的这一构想是天真的, 属于典型的乌托邦, 因为劳动在现实中永远是一种必要的强制的工具性活动, 不可能成为一种自由自觉的“目的性”存在。她说: “为生存所必需, 人的条件内含的劳动这一活动变得越来越容易了, 可是依然没有失去强制和必要的特性……马克

收稿日期: 2023-12-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8ZDA015); 深圳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课题(Cgpy22026)

作者简介: 彭小伟(1981—), 男, 广东省茂名市人, 嘉应学院讲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 张雷(1982—), 男, 山东省济南市人,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劳动教育。

思对未来的消除绝对支配的期待,只能带有乌托邦色彩。”^{[2]45}在此,阿伦特的质疑是否合理?马克思的劳动解放何以可能?换言之,劳动能否超越资本,实现从手段到目的的转变?对此问题的回应,构成了本文的论域。

一、目的与手段:马克思劳动范畴的内在张力

亚当·斯密曾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将劳动划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前者是雇佣劳动者为了获得劳动报酬而为资本家创造利润的生产活动,后者是雇佣劳动者为了生产自身需要而展开的活动。马克思将前一种生产称为“手段”,而将后一种生产称为“目的”。他认为,前一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其外在性表现为:“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3]159}而后一种劳动是出于劳动者自身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它是积极地、主动地、自由自觉地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的生产。这种劳动不仅将生产当作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且它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二重性是指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那么,其人本学意义上的劳动二重性则是目的和手段。

尽管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劳动学说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从资本主义生产性质的角度抓住了劳动的特性;但是,与亚当·斯密不同,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本质被全盘否定了。而这种作为目的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这种劳动的意义“是由必须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必须由劳动来克服的那些障碍所提供的。但是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而且进一步说,外在目的失掉了

单纯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外观,被看做个人自己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做自我实现,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这些也是亚当·斯密料想不到的”^[4]。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具有二重性:一是仅仅作为谋生手段的生产活动,即劳动对“障碍”的克服;二是不仅将生产活动本身作为手段,而且将活动本身看作目的。

作为目的的劳动,使人获得一种“类”的特性,进而成为区别于他物的类存在。由于这种“类”的特性,劳动不仅是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而且这一劳动过程就是目的本身。也就是说,人通过劳动将整个自然界作为自己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成了自己生命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人是自然化的人,自然是人化的自然,形成一个“大写的人”。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3]207-208}这样一来,通过劳动(作为目的的劳动),人以一种全面融合的方式享受自然、同化自然和发展自然。阿伦特曾对马克思的劳动理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她说:“在现代发展中,马克思的杰出贡献不在于他的唯物主义,而在于他是唯一一个一以贯之地把他的唯物主义利益理论建立在人类无可置疑的物质活动基础上,建立在劳动上,即人身体与物质的新陈代谢基础上的政治思想家。”^{[5]193}但是,马克思的这种人与自然的“融合”,在阿伦特看来却是一种私有制意义上的“占有”。她认为,马克思虽然也区分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但是,不管哪一种劳动,其自身都是一种生产力,都属于劳动者自身的一种潜能(劳动能力)。因此,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和传统的劳动概念一样,都“是指生产维持生命体必需的物质的手段”^{[2]16}。据此,阿伦特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

潜藏着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人作为劳动的动物,劳动既是其手段,又是其目的,要想通过劳动的解放到达自由的王国——共产主义,只能是在做无限重复劳动的西西弗,在“生产性的奴役”与“非生产性的自由”之间痛苦徘徊^{[5]75-76}。由此可见,阿伦特确实误解了马克思的劳动解放理论。

对此,有学者指出,阿伦特之所以误解了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原因在于她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消灭劳动”的观点与《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自然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观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由此误读了马克思的“消灭”(扬弃)一词,将“自然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简单地对立起来,进而导致了“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是混乱(的)”的误解^[6]。不可否认,该学者的文本分析是非常深刻的,但是由于其未能深入剖析阿伦特将“自然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对立起来的根本原因,其对阿伦特的误解未能形成有力的反驳。在马克思劳动理论之完整性的意义上,我们认为:一方面,阿伦特误解了马克思劳动概念的二重性。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既有手段的属性,又有目的的特性,前者对应于自然属性,而后者则对应于社会属性。但是,阿伦特的问题恰恰出现在对后者的理解上,认为作为目的的劳动与作为手段的劳动是截然对立的。这一误解可以表述为“劳动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这与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原意(劳动不仅是手段而且是目的)无疑相去甚远。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之所以使得包括阿伦特在内的学者产生误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的手段属性过于凸显,以至掩盖甚至丧失了劳动的目的属性。因此,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反复批判了只剩下手段属性的异化劳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因此使得读者的目光只聚焦于他所批判的对象上,从而忽略了劳动的手段与目的的内

在关联。

另一方面,阿伦特未能深入理解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的“自然必然性”与“经济必然性”之间的深刻内涵,片面地从“自然必然性”的角度解读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忽略了其“经济必然性”的维度。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中的“自然必然性”是人之生存的前提,而“经济必然性”是社会关系得以存在之基础,两者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不仅是手段而且是目的。也就是说,在现实性上,劳动是人作为自然存在的前提,无论是在原始社会,还是在奴隶社会;无论是在封建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在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如此。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阿伦特认为,劳动的“强制和必要的特性”是永远无法消除的。但是,阿伦特以此断定马克思的劳动解放是一种“乌托邦”则是对马克思的严重误解。我们认为,马克思无意于消除劳动的“自然必然性”,而且他也深知这是不可能的。他明确指出:“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7]928-929}也就是说,马克思反对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力沦为商品,资本掌控了劳动的“经济必然性”,使劳动的“自然必然性”成为一种盲目的力量统治着人自身。如此,劳动的“经济必然性”异化了。在马克思看来,作为手段的劳动是必然存在的,它是人类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中介或手段。因此,在“自然必然王国”,劳动是作为手段而存在的;其作为目的的存在则是在“自由王国”,而后者则是马克思所要追求的解放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并非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意义上的理想国,而是指“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劳动作为目的,就存在于这个彼岸之中。“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7]928}这里的“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仅仅作为手段而存在的劳动。只有“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7]929}。可以说,劳动的目的属性是建基于其手段属性之上的,只有从其手段属性亦即物质生产领域中解放出来,劳动才能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而存在。只有这样,劳动才恢复其双重属性,即不仅是手段而且是目的。也只有这样,人类才能进入“自由王国”。

事实上,在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中,特别强调的是劳动的目的属性,但是,其劳动理论从来都不排除手段这一属性。马克思之所以强烈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因为这一生产关系体系过分夸大了劳动的“手段”属性,使人忽略甚至丧失了劳动的“目的”属性。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分析马克思是如何揭露资本主义的“吃人”本性以及在资本“无限增殖”的魔咒下,雇佣工人何以丧失了劳动的“目的”属性,而仅仅剩下“手段”这一功能,最终沦为资本主义机器体系中的一个“部件”。

二、资本的魔咒:仅作为手段的劳动

“人是机器”是18世纪法国机械唯物主义代表拉美特利的观点。在他看来,人跟动物一样都是物质实体,所谓的灵魂也是肉体的产物。拉美特利从生理学的角度分析了灵魂与肉体、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认为“人是一架物质机

器”。与拉美特利不同,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分析了机器、劳动(身体)与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在资本的统治下,劳动(身体)由中心走向边缘,其创造价值的中心地位被机器所取代。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劳动失去了其原有的身体属性,沦为仅作为手段而存在的工具,成为机器的一部分。因此,作为劳动主体的人,不再具有目的属性,而是一部被启动的“机器”。

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生产阶段,劳动处于生产的中心地位,作为工具的机器只是工人劳动过程中的支配对象。“工人把工具当作器官,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因此,掌握工具的能力取决于工人的技艺。”^{[8]91}也就是说,单个的机器是作为劳动工具存在的,其在商品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取决于劳动者的技能发挥。但是,进入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阶段,以体系形式出现的机器则占据了商品生产的中心,劳动与机器的地位发生了颠倒。工人成为机器的一个“器官”,充当着“管家”的职能。“机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表现为单个工人的劳动资料。机器的特征绝不是像[单个工人的]劳动资料那样,在工人的活动作用于[劳动]对象方面起中介作用;相反地,工人的活动表现为:它只是在机器的运转,机器作用于原材料方面起中介作用——看管机器,防止它发生故障。”^{[8]90-91}随着机器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工人的劳动不再是传统的核心的直接劳动,而是微不足道的间接劳动。相反,作为劳动资料的死劳动,机器体系在商品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处于中心地位。也就是说,死劳动“活了”,活劳动“死了”。“劳动现在仅仅表现为有意识的机件,它以单个的有生命的工人的形式分布在机械体系的许多点上,被包括在机器体系本身的总过程中,劳动自身仅仅是这个体系里的一个环节,这个体系的统一不是存在于活的工人中,

而是存在于活的(能动的)机器体系中,这种机器体系同工人的单个的无足轻重的动作相比,在工人面前表现为一个强大的机体。”^{[8]91}这样一来,劳动与机器的关系发生了颠倒,劳动失去了其目的属性,仅仅残留着手段的功能。工人成为机器体系中的一个无足轻重的“部件”,一具本拥有着灵魂的血肉之躯沦为一架会说话的“机器”。

在机器体系下,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不断缩减,劳动技能不断退化,劳动能力不断贬值,雇佣工人的收益与其生产的商品数量成反比,工人的劳动发生了异化:生产的商品越多,工人们越贫困;劳动的时间越长,工人们越感到不幸;工人们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进行自由自觉的劳动而是遭受着灵魂和肉体的折磨。在他们看来,劳动犹如瘟疫一般可怕,一旦那些强迫人们进行劳动的力量消失了,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一样逃离劳动。在这种生产关系下,劳动俨然失去了其自由自觉的为劳动而劳动的目的属性,劳动者不仅与劳动自身产生了异化,还与劳动产品发生了异化;不仅与自身的类本质相异化,还与其他劳动者之间发生了异化。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劳动与机器的关系发生了逆转?又是什么使得劳动产生了上述一系列的异化?马克思的回答是: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正是由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工场手工业生产变成了机器大工业生产,机器体系代替了分散的单个劳动力;正是由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直接劳动变成了微不足道的间接劳动,机器成为了商品生产的中心;也正是由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活生生的工人变成了一部部僵死的“机器”,活劳动成了死劳动。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本性是无限增殖。因此,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资本就开启了对劳动的吸纳、规训与惩罚。

首先,从劳动时间来看,劳动被吸纳到资本的逻辑进程之中。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财富的唯一源泉是劳动时间。因此,延长劳动时间和扩大劳动时间的总量成了资本增殖的主要方式。为了既能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又能防止工人罢工,资本只能充分发挥机器在商品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这样一来,机器在资本增殖的历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由原来某一生产环节的单个机器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机器体系。因此,机器由原来的劳动资料变成了机器体系。“劳动资料发展为机器体系,对资本来说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使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劳动资料适合于资本要求的历史性变革。”^{[8]92}也就是说,机器体系的形成是由于资本的内在要求所致,劳动被吸纳到资本的逻辑进程之中。因此,顺着历史车轮的前进方向,资本主义由工场手工业进入了机器大工业时代。

其次,从劳动分工来看,劳动者(躯体)成为资本规训的对象。随着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到来,资本对劳动的要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工场手工业时代,雇佣工人拥有一套完整的劳动技能,资本家根据工人的技能状况,使劳动适应于工人。但是,到了机器大工业时代,雇佣工人的专业技能被肢解了。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每个岗位上的雇佣工人只需要熟练掌握该生产环节的某一单一技术即可。在自动生产线上,每个工人都必须去适应机器的操作要求和运行速度,此时的工人只能适应于这种机械式的简单劳动。“劳动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了专业的性质”^[9],劳动者只能在资本的规训下进行生产。随着机器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越来越广泛,作为科技载体的机器已然成为商品生产的核心,进而取代劳动成了财富的源泉。这样一来,劳动被边缘化,劳动者成了机器的一个部件,人变成了机器。

再次,从劳力分离来看,劳动者(智力)难

免遭受资本的惩罚。在机器大工业时代,资本增殖不再取决于劳动分工,而是取决于机器的智能水平或者说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因此,在资本的魔咒下,劳动与智力实现了分离,“这个分离的过程在简单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3]418}。作为劳动者智力的科学技术,成了资本增殖的核心驱动力。资本家的财富积累不再取决于工人的劳动时间,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8]92}。由于机器体系的应用,劳动者被排斥在商品生产之外,沦为相对过剩的“部件”。资本“将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资本的增殖时间。这种对家庭和儿童的精神摧残,严重阻碍了儿童的身体和心智的健康发展,‘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废’”^[10]。更为可怕的是,在消灭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所能掌握的技艺后,资本家又对其进行重构,并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11]。也就是说,与工场手工业不同,雇佣工人在机器大工业中失去了对自身劳动过程的控制,取而代之的是机器体系。“资本主义通过发展机器的每一个特性来为自身服务,最终让机器支配工人,死劳动支配了活劳动。”^[12]作为智力载体的机器,反过来成了支配劳动者的力量。工人的专业技能被抽象为简单而空洞的机械动作。工人身陷被动的境地,成为机器体系的一个环节,其智力也变得毫无意义。

因此,在无限增殖这一魔咒之下,资本通过压制雇佣工人的专业技能和智力发展,实现了对科学知识或一般智力的运用之垄断,进而迫使一般智力与直接劳动相分离。至此,作为目的的劳动与工人截然分离开来,工人的劳动退化为与劳动的本质相背离的、仅仅作为手段而存在的机械劳动,工人沦为机器体系的附属品,变成了一部会说话的机器。那么,劳动能否从资本的规训中解放出来,实现从手段到目的的

转变,回归劳动的本质?对此,马克思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三、从手段到目的:超越资本的劳动何以可能

在马克思看来,导致劳动异化为手段的原因并非机器本身,而是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他说:“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13]这里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无疑就是“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也就是说,要想实现劳动对资本的超越,就要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入手。劳动的解放,并非砸碎资本主义工厂的机器,而是消除这种机器体系背后的控制力量,即异化了的劳动“经济必然性”。只有这样,劳动才能恢复其自由自觉的本质属性,实现从手段到目的的转变。

在传统的解释中,马克思劳动理论的“自然必然性”与“经济必然性”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人们在探究马克思的劳动解放时仅仅聚焦于“公有制如何代替私有制”而忽略了“经济必然性”这一重要因素,进而未能彻底地解决马克思的劳动解放问题。因为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并不仅仅是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在马克思看来其历史内涵是对经济必然性的扬弃^[14]。对此,有学者论证了共产主义与经济必然性的内在关联,认为经济必然性作为具体的必然性是人的一种社会存在状态,人的自由和解放即共产主义就是对这种状态的超越^[15]。可以说,这一创见是极其深刻的。遗憾的是,这一论断仅从历史必然性的角度阐明了共产主义与经济必然性的内在统一性,却未能深入发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核心即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因为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是扬弃经济必然性、共产主义得以可能的关键。甚至可

以说,劳动超越资本,是共产主义得以可能的前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异化了的劳动经济必然性已然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绊脚石。

那么,劳动如何从物质生产领域中解放出来实现对资本的超越?或者说如何消除异化了的劳动经济必然性?对此,马克思提出了以下两个途径。

其一,劳动与智力相分离,使劳动摆脱资本的控制,回归其手段属性。马克思指出,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中,由于机器体系的广泛应用,工人的劳动逐渐被边缘化,工人的专业技能被肢解,劳动技能呈碎片化趋势,生产技术不再由某一单个的雇佣工人所掌握,而是集结于整个机器体系之中。这样一来,劳动与智力实现了分离。据此,马克思认为,资本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潜藏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随着这一矛盾的不断扩大和升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处于无法克服的境界,最终导致资本体系的崩溃。这样一来,劳动的经济必然性自然就消除了。这一无法调和的矛盾就是传统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财富积累的唯一源泉就是“直接劳动时间”。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或前提“现在是而且始终是:直接劳动时间的量,作为财富生产决定因素的已耗费的劳动量”^{[8]100}。但是,如前所述,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机器大工业阶段,机器体系代替传统的直接劳动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工人劳动成为机器体系中的一个“部件”,其在商品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不断下降。相反,机器及其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应用则不断上升,以至成为资本增殖的决定性因素。这样一来,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基础的“劳动价值论”就会崩溃。“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但是,“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

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8]101}。也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崩溃,劳动自然摆脱了资本的控制,消除了经济必然性的束缚,回归自身的本质属性。但是,这种本质属性更多地表现为劳动的手段属性,因为此时的劳动只是实现了从生产剩余价值到生产使用价值的转变,其目的属性却未见彰显。可以说,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中,劳动与智力的分离,促使劳动摆脱了资本控制,却未能超越资本。因此,马克思进一步作了更加深入的论证。

其二,劳动与生产相分离,使劳动得以超越手段属性,彰显其目的属性。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一旦与智力相分离,意味着智力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而且,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智力在生产中贡献的比重越来越大,相反,工人劳动的贡献比重越来越小,这样就为工人节约了大量的直接劳动时间。马克思认为,“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8]104}。也就是说,由于智力在物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工人节约了大量的劳动时间,工人甚至可以从生产中抽身出来从事非物质生产活动,例如,“从事各种科学或艺术的生产的人,工匠或行家,为书商的总的商业资本而劳动,这种关系同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关,甚至在形式上也还没有从属于它”^[16]。如此,劳动与生产相分离。进一步地,马克思指出:“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的时间就越多。”“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17]对于工人

而言,节约了劳动时间,就“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8]107-108}。这样一来,劳动的形态就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它不再表现为单纯的物质生产活动,而是转化为每个人在自由时间内所从事的一种高级活动;它的目的也不再是生产生活资料,更不是生产剩余价值,而是每个人的自我实现^[18]。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社会追求的既不是工场手工业阶段的劳动时间,也不是机器大工业阶段的科学技术,而是自由时间。正是因为劳动与生产相分离,劳动才从物质生产领域中脱离出来,节约了大量的劳动时间,从而获得了能够从事自由自觉活动的自由时间。因此,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8]108}也就是说,因为节约劳动时间,人可以从中获得大量的自由时间,进而能够生产和发展自己。如此,劳动从手段转化为目的,成为每一个自由人的“类”本质。

四、结语

马克思视阈中的劳动二重性在政治经济学上表现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在人本学上则表现为手段和目的的双重属性。马克思并不否定劳动的手段属性,他所批判的是,资本规训下的劳动之手段属性变成了盲目的力量并反过来奴役人自身,因而丧失了目的属性。这样一来,工人就变成资本主义机器体系中的一个“部件”,在无限增殖的资本魔咒下,人沦为机器。因此,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就是要清除这种资本魔咒强加给劳动的经济必然性,使劳动摆脱资本的控制,恢复其原有的手段和目的属性。据此,马克思恢复了人本学意义上的劳动二重性:劳动不仅是手段而且是目的。阿伦特误解了马克思关于劳动二重性的洞见,在她看来,马克思的劳动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之所以如此,原

因有二:一是阿伦特误解了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将手段属性与目的属性对立起来;二是未能将马克思劳动理论的自然必然性与经济必然性区分开来,仅从自然必然性的视角去解读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因此,为了消除阿伦特的误解,我们必须深入探析劳动超越资本何以可能这一重要问题,由此凸显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的深邃思想意蕴。

综上所述,马克思分两步阐明了劳动的解放何以可能:首先,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中,科学技术成为资本增殖的源泉,劳动在商品生产中的作用被边缘化,劳动与智力相分离。这样一来,资本就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资本既要把劳动时间压缩到最短,又要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源泉。因此,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其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广泛应用,科学技术或机器体系必然取代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源泉和尺度。这样,资本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必然崩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也应然解体。此时,劳动也就摆脱了资本的控制,消除了异化了的劳动经济必然性。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劳动仅仅复归了手段的属性,还没有实现其目的属性。其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机器体系在生产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使得工人的劳动时间走向绝对剩余,劳动与生产相分离。这就为工人节约了大量的劳动时间,也等于为工人增加了大量的自由时间,进而工人可以自由从事非物质生产等其他活动。这样一来,人们在劳动的同时,既是在生产生活资料,又是在生产自身。此时的社会追求不再是工厂手工业中的劳动时间,也不再是机器大工业中的科学技术,而是具有劳动目的属性的自由时间。如此,劳动就实现了从手段到目的的转变,实现了对资本的超越,成为自由自觉的人的类本质。

马克思的劳动解放理论是围绕着“资本与劳动”这一中心展开的。在他那里,劳动具有

手段和目的双重属性,也就是说,劳动不仅是手段而且是目的。马克思的劳动解放理论正是通过从手段到目的的转变实现劳动对资本的超越。造成阿伦特误解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只是片面地解读马克思的劳动范畴,把劳动的目的属性与手段属性对立起来。厘清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问题,深入理解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的内在逻辑,不仅有助于回应各种针对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的质疑,而且有助于准确定位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论旨趣,为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
- [2] 阿伦特. 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M]. 孙传钊,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4.
- [5] 阿伦特. 人的境况[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6] 官敬才. 试论马克思的劳动哲学本体论[J]. 河北学刊,2012(5):16-28.
-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9.
- [10] 孙乐强. 马克思“机器论片断”语境中的“一般智力”问题[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0(4):10-18,122.
- [11] HARRY B.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M].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98:54.
- [12] 夏永红,王行坤. 机器中的劳动与资本: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机器论[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4):53-61.
- [13]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93.
- [14] 王贵明. 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J]. 南京社会科学,1999(10):15-22.
- [15] 王贵明. 论对经济必然性的扬弃[J]. 重庆大学学报,2000(6):123-127.
- [1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43.
- [1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23.
- [18] 孙乐强. 劳动与自由的辩证法:马克思历史观的哲学革命[J]. 哲学研究,2016(9):8.

[责任编辑:侯圣伟 聂海杰]



引用格式:彭小伟,张雷. 从手段到目的: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的内在逻辑——兼论阿伦特对马克思的重大误解[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5(4):26-34.